

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

——重温毛泽东关于民主党派监督的相关论述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举措。各级党委要支持民主党派履行监督职能，重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意见、批评、建议。重温毛泽东关于民主党派监督的相关论述，对于我们做好相关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 邵云峰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斗争中，确立了中国各种革命力量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长期实践中经过比较，自觉地、郑重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这种监督是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更需要来自民主党派的监督。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内容是：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情况；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的工作和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为政清廉等方面的情况。民主党派的监督，对于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健全社会主义监督体系，有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十分注意发挥民主人士的监督作用。1941年11月，他在陕甘宁边区

参议会演说中指出：共产党有毛病，也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起来。”

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曾问毛泽东：中共怎样找到一条新路来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8年4月，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提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和阐述了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思想，并且批评了在对待党外民主人士问题上存在的关门主义等错误倾向，要求全党对

于这个问题必须有认真的检讨和正确的认识。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共同纲领》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在法律上和实际上得到了确立。

1950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指出：“要充分看到民主党派的作

用。有人认为民主党派只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不拔去都没有关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联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从他们的背后联系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就不可藐视。”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同年9月，中共八大正式确认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的重大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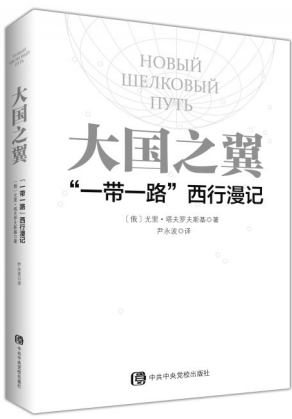
长期共存，就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长期不变，共同存在，着眼于中共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客观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坚持团结合作的长期性。也就是说，各民主党派在接

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长期合作中同存在、同呼吸、共命运。

互相监督，就是各党派之间互相提意见，作批评，着眼于中共执政的需要，坚持互相监督的必要性。互相监督不是单方面的，中国共产党可以监督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共产党主动邀请党外人士监督；另一方面，民主党派也应该接受共产党的监督，越是监督，越是能进步。由此可见，互相监督是各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价值所在。只有实行互相监督，才能巩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友好关系。因此，“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实际上是一个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完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关系的方针。

关于提出和坚持这一方针的原因，毛泽东解释说：“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他还说：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朵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党要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



近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一带一路”西行漫记——一个俄罗斯学者眼中的“一带一路”》面世了。该书作者尤里·塔夫罗斯基，是俄罗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耗时一年半，实地考察了江苏、河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省区后，详细解读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还描绘了古丝绸之路的历史，并以国际视角向世界展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成果。

作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已引起了全球广泛关注。三年多来，中国不仅是该理念的首倡者，更是有责任、有担当的实践者。“一带一路”建设正在由点及面地积极推进。

作者通过本书，想重点告诉读者三点。

其一，“一带一路”建设植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中，同时它面向未来，沟通中国和世界。“一带一路”就像一张大的“拼图”，现在需要把它们拼接起来。作者坦言，“我在完成中国的考察并参观完‘一带一路’的各主要站点之后，我对此就更加确信了”。

其二，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依靠自己的经验，加快开发落后的西部省份，既努力扩大中国产品的市场，同时也力争做到与邻国共同走向繁荣。“一带一路”中国国内沿线路段的建设成果，不仅为这些地区带来有用的基础设施、创造了新市场，同时也将亚洲和欧洲各国的企业紧密连接在一起，带来了新的贸易路线和更好的互联互通。

其三，“一带一路”三年多来的建设成果，让有些国家怀疑的眼光变成了赞许的目光。事实上，向欧亚大陆的邻国提出共同开发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的宏伟计划以后，中国已经从追求扩大产品销售转变为建立新的市场和扩大现有市场。目前已经在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希腊、匈牙利、塞尔维亚和白俄罗斯等国家，实现了在最优惠的条件下建设铁路和公路、隧道、水坝、科技园和自由贸易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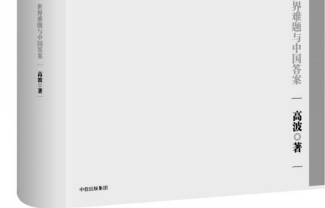
5月17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在大有书局举办了《“一带一路”西行漫记——一个俄罗斯学者眼中的“一带一路”》领导干部部读书会。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出席读书会并作了总结发言，对该书给予了较高评价。

□ 张丹丹

一个俄罗斯学者眼中的『一带一路』



反腐败与建设“规则社会”



□ 吴雯雯

正确判断形势是科学决策的前提，也是取得成功的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的反腐形势从“依然严峻复杂”到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指出“腐败和反腐败呈胶着状态”，到十八届中纪委六次全会指出“反腐败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2016年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

“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这将会给我们的政治生态带来什么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

研究中心高波的《廉洁拐点》（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3月出版）一书，立足国际与国内两种视野、历史和现实双向思考，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来的反腐倡廉建设，提出治理腐败不仅是政治过程，也是社会过程。我们应乘势而起，打造一个有底线、有边界、有规则的现代治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反腐败不仅是为社会“刮骨疗毒”，更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所谓乘势而起，就是要乘“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之势，努力建设现代“规则社会”。

第一，立好党内“明规则”。共产党员应遵行的“明规则”主要包括：党章，这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总规矩。党的纪

律，尤其是规定全党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的政治纪律。国家法律，在这一点上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都没有例外。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这些是不成文的规矩。这四类明规则的确立与执行，能为党和国家治理提供“准星”与“标线”。2015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同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并已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2016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新形势下，我们要在发挥思想引领作用的前提下，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真正做到铁规发力、禁令生威。

第二，抓早抓小，尽力消除用权“潜规则”。治理腐败这种顽疾，要抓早抓小，防患于未然、治病于初萌，尽力消除腐蚀党员干部、败坏党风政风的“潜规则”。要抓时间节点，前移监管关口，推动党风政风好转；抓具体行动，把凡是体现权力属性的公务活动、行为方式管住，让反腐败成效看得见、摸得着；抓公款公车使用，凡是花公款的地方，钱再少也不能纵容，凡是用公款的地方，事再小也不能漠视。要深入践行“四种形态”，让党员干部的脱管率降至最低，防止小病养大、大病恶变。扎牢制度的笼子、织密监督的网，重视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腐败。

第三，在全社会弘扬和培育“规则意识”。一些人往往认为程序就是一个形式，遇到一些工作

中的重大事项或与自己有关的事情，就不走程序，习惯于“找熟人疏通，走捷径”。事实上，现代的法社会是有边界、有规则的社会。我们既要追求实体结果的正义，也必须保证程序和过程的正义，这就是所谓的规则意识。

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人心才是最大的政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反腐败斗争取得显著成效，但建设“规则社会”仍然任重道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经过长期积累形成的，具有隐蔽性、顽固性和复杂性。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要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不破楼兰终不还，坚决打赢这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斗争。

如何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任维维认为，根据国内外的实践经验，科学编制和演练应急预案是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的关键。各级领导干部需要履行“一岗双责”，既要做好常态的公共管理和风险防范，又要做好非常态的突发事件应急应对处置。

如何提升公共危机治理的领导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唐亚林认为，应对公共危机，需要从组织的团队建设



社区大拆大建矛盾、农村土地确权矛盾、农业生产方面的矛盾、惠农资源配置矛盾以及其他方面的农村社会治理矛盾。基于对农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分析，下一步政策设置需注意：要明确农村建设的定位，珍惜农村土地制度，提升农村基层治理能力。

群体性事件中微信动员引起舆情复杂多变，加速风险聚集，如何应对？华北电力大学副教授樊良树认为，微信舆情生成的互动性、即时性、容易极化等特点使得群体事件网络动员的个体构成、演化进程复杂多变，大大压缩群体事件从话语到现实行动的时空进程。必须对症下药，多管齐下。要提高网民自律意识，压缩早期负面舆情萌芽土壤；及时准确发送官方权威信息，防止负面舆情扩散；加强有影响力人士的话题引导能力，促进舆情压力的自我消解。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年第5期聚焦

提升社会风险防范应对水平

□ 吕红娟

现代社会风险问题是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今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2017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要提高对各种矛盾问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不断创新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全面提升防范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水平，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当前应如何全面提升防范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水平？2017年第5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专门组织专家学者撰文探讨。

当前转型期的社会风险来源何在？表现有哪些？最佳的治理路径是什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董星认为，社会风险源于社会的变迁与转型。中国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社会转型期，又处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世界大潮中，因而既存在亨廷顿所说的现代化中的动荡和风险，又存在贝克、吉登斯所说的风险社会的风险。必须针对当前社会矛盾的几种形式，建立健全相应的阻断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安排。

公共安全背景下政府的责任是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教授认为，政

府的安全工作，不仅要主动负责，更需要科学担责。要在掌握与遵循公共安全特征的基础上，不断巩固公共安全的社会根基，积极承担应有的多元责任，持续提升公共安全的实效。

当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运行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何破解？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朱正威和其博士生共同撰文，认为，由于政策环境、行政理念等复杂因素影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在评估对象、评估主体、评估方法、身份定位等层面仍面临着一定程度的运行困境，亟须从不同层面进行有针对性的修正。

新书速览

《领导干部新文风》，洪向华主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风问题，把改文风列为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本书以生动的范例，深入浅出地论述了新时期领导干部如何身体力行、勉力而为，克服“长”“空”“假”的恶劣文风，提倡“短”“实”“新”的清新风，真正使讲短话、讲实话、讲新话蔚然成风。这是一部领导干部改进公文和理论研究文章写作的教科书，一部领导干部提升正式讲话和即兴演讲语言水平的实战书，一部领导干部完善正式会议文稿和非正式会议文稿起草的工具书，一部领导干部提高外事活动能力的参考书，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信仰人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传统》，潘维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

本书纵论21世纪的世界大势，以贯通中西的视野聚焦中国真问题。书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统中汲取的“民本”政治传统中汲取精华，提高组织社会和群众的能力；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如何提高思想能力，对社会主义理论和话语推陈出新；探讨了当前国家治理的核心任务；讨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关于土地流转方向等关键问题。

